

# 測繪冷戰文化地形圖： 張愛玲與《秧歌》

• 王曉珏

**摘要：**通過對小說《秧歌》的構思和寫作過程的討論，本文測繪了冷戰初期，張愛玲的文化活動軌迹與冷戰歷史地理情境之間的關係。本文首先論述在1950和60年代台海兩岸分隔的背景下，流寓紐約的胡適和客居香港的張愛玲書信往來，討論《秧歌》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藉此反思「平淡而近自然」的文學特徵。然後，以互文解讀的方法，探討《秧歌》和社會主義中國初期的新農村電影《太平春》（1950）與《遼遠的鄉村》（1950）之間的關聯，思考身處對立意識形態陣營的文藝創作者，如何回應變化莫測的文藝政策，設定自我的文化位置，尋求可能的藝術創作題材和風格。最後，從敘事風格和性別政治的角度出發，討論《秧歌》中包含的典型文化冷戰敘事類型——間諜敘事，並以此探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文化冷戰策略與新中國文藝政策之間意味深長的交集。

**關鍵詞：**張愛玲 《秧歌》 《遼遠的鄉村》 間諜敘事 文化冷戰

近年來，隨着張愛玲（1920-1995）後半生文字接二連三地「出土」，晚期張愛玲研究不再只是勉強為之的論題<sup>①</sup>。1949年政局變動之後，張愛玲的文化活動軌迹跨越了冷戰的地緣政治分隔。她在上海、香港、台灣和美國的文化經營和實踐，與亞洲和國際冷戰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息息相關，其中關聯並非文學和政治、漂泊個體和歷史權變的糾葛可以大而化之、一筆帶過。1949年的政治分裂，是斷裂也是延續和轉折，是危機也是契機，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走向開啟了新的局面，更深刻地影響了張愛玲的晚期文化活動。冷戰帶來的地緣政治分野，導致跨國族、跨地域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力量的消長、流動和轉移，既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各自堅壁清野的意識形態的遏制，同時也是各個陣營努力開疆拓土、尋求聯盟的新的國際整合<sup>②</sup>。在政治、文化、語言層面上，國際冷戰格局引發了歧義紛呈的族群、疆土和現代

主體性的想像，生成了新的邊界、中心、路徑、網絡與交叉點，並形塑了新的冷戰文化地形圖。

*The Rice-Sprout Song* 是張愛玲以英語寫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作於1954年的香港，同年，她改寫成中文版的《秧歌》，在香港美國新聞處 (USIS) 旗下的《今日世界》雙周刊上連載。1954年7月，中文單行本作為「今日世界叢書之九」由今日世界社結集出版，封面、插圖出自上海漫畫家薛志英之手；英文本則於1955年由美國紐約斯克里布納 (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社出版。《秧歌》的出版、翻譯和發行與美國冷戰宣傳機構及其所建立「自由亞洲」的政治文化區域之間的關係毋庸置疑。1949年前後，大批流亡知識份子南下香港，香港成為亞洲文化冷戰的前哨，在冷戰期間的第一場區域熱戰——朝鮮戰爭爆發以來，香港作為自由世界在亞洲的樞紐地位更是不可撼動。除了美國官方代表機構 USIS，中央情報局 (CIA) 秘密資助的以非政府組織面貌出現的亞洲基金會 (Asia Foundation)，以經費贊助、出版等方式輔助美國政府的政治宣傳，傅葆石、王梅香等學者已經做了相當精彩的研究<sup>⑩</sup>。

本文在現有的《秧歌》研究基礎上，測繪經由《秧歌》的構思和寫作而交織形成的文化地形圖，涉及冷戰初期的上海、東北、香港和紐約等重要時空點，以此來梳理張愛玲的文化活動軌迹與冷戰歷史地理情境之間的關係，旨在把晚期張愛玲研究和文化冷戰研究結合起來，開闢新的面向。本文首先論述在1950和60年代台海兩岸對峙局面形成的背景下，分處於紐約和香港的胡適和張愛玲通過對《秧歌》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兩部作品的討論，對晚清以來中國文學表現的現代性問題作出反思。然後，通過對《秧歌》和社會主義中國初期的電影《遼遠的鄉村》(1950)與《太平春》(1950)的互文性解讀，探討身處對立意識形態陣營的文藝創作者，面對冷戰初期風雲變化的文藝政策，如何設定自己的文化位置，探索藝術創作的可能性、題材和風格。最後，從敘事風格和性別政治角度出發，對《秧歌》進行冷戰間諜文類的解讀，探討美國在亞太地區推動的文化冷戰策略與新中國文藝政策之間不經意的交集。

## 一 「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回去？」

1954至1955年正值第一次台海危機，國共雙方處於軍事緊張態勢之下。兩岸在大陳島的衝突角逐直接影響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利益，以及亞太地區逐漸形成的冷戰地緣政治，美國冷戰戰略部署重心因而轉到亞洲。1949年後，胡適流寓紐約，在美國主流媒體慨歎所謂的「痛失中國」(China loss) 的消沉氛圍中，在在關注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在冷戰局勢中實現的可能性。台海局勢的變化和美國對台政策的發展正是寓居紐約的胡適關注的焦點，其在1955年初的日記中的記錄和評論，皆關乎於此。1955年1月25日，胡適寫道：「這一天的國際形勢的變化，是一九四五年至今九年中的最重大變化。」「我這幾年來，人問我『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回去？』我總回答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今天的變化是『近在眼前』的趨向了。」胡適還在當天和第二天的日記中剪貼了三份報導，包括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 (Dwight D.